



秀州人物

第二辑

嘉兴市秀州中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

秀州人物

第二辑·人物

浙江省嘉兴市秀州中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

前 言

我们嘉兴秀州中学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100年前，“开浙西风气，辟城北草茅”，中西汇融倡新学，“破天荒兮惟我校”。100年间，“负笈如云集，竞业多凤毛”，人才辈出，各领风骚。100年来，团结奉献，为我校风；人格垂范，为我教风；学做结合，为我学风；爱国，爱校，爱民主，爱科学，为我优良传统；全面发展，提高素质，培养能力，发展特长，突出外语，开拓创新，为我办学特色。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校容校貌焕然一新，教育质量蒸蒸日上，校誉日增，业绩日新。我们现在庆祝建校100周年，既是一世纪光辉校史的总结，更是新千年再创辉煌的开端。

百年树人，为的就是富国强民，振兴中华。秀州钟声之所以“嘹亮入层霄”，最令人景仰的莫过于群星璀璨的秀州学子为人类、为祖国、为家乡建立了丰功伟绩。为使秀州事业不断前进，为使秀州雄风长盛不衰，为使秀州学子青胜于蓝，我们把新世纪新起点的教育视角，落在大力弘扬人文科学优良传统教育上面，编印了这套《秀州人物》系列丛书，集前辈校友好学力行、成才经验和光辉业绩之大成，给后代学子树立奋发上进的榜样，教育激励未来新人效法先哲前贤，自强不息，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服务人民，造福人类。这套丛书和校史陈列馆、校史文集、校庆纪念册、《顾惠人校长纪念集》以及“惠泉亭”等校园景观，构成有秀州特色的人文科学优良传统系列教材。这是我们秀中教育的传家

瑰宝。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这种人文科学优良传统教育，调动起学生“学做结合”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使自己成为有远大理想、高尚人格、扎实知识、健康身心、能力特长的 21 世纪新青年，为自己的一生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秀州中学桃李满天下，英才以千计。这套丛书之所以定名为“秀州人物”，是因为专业不相同，岗位各相异，贡献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人物”这个词内涵广，外延大，容量多，可以吸纳各行各业校友的光辉事迹，转化为培育学生成德达才的丰富营养。第一辑为海内外科学院院士，以后涌现的新院士可为续辑。第二辑是根据截至目前收集到的校友本人及关于校友的文章，按届别为序编纂成书。我们热忱希望广大老中青校友，将自己的光辉事迹写成文章，给母校这套丛书增光添彩。我们将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整理成册，陆续出版，使母校的人文科学优良传统教育不断增加新的血液。这也是校友们向母校献爱心，为母校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衷心感谢惠赐华章共襄《秀州人物》出版的各位校友及其亲属。同时也希望广大校友和读者，谅解我们水平有限，加之资料不全，有的遍找无着，编纂中缺点错误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徐九勇

2000 年 10 月

书生本色

赵传家(1897—1993),浙江嵊县人。1917年本校毕业。教授,教育家。

赵传家,1907年就读于嘉兴秀州书院(秀州中学前身)。上海沪江大学教育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州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曾执教于秀州母校及绍兴越材、杭州蕙兰等中学。曾任上海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干事。30年代曾任秀州中学校董会主席。1938年协助顾惠人校长在上海开办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任校董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任上海西侨公学校长,市西中学校长,兼任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教授。期间又还协助秀州母校回嘉兴复校,担任校董会主席。1950年任上海市西中学校长。1984年任市西中学名誉校长。他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曾荣获上海市优秀教师称号。秀州中学恢复校名以后,他是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兼上海分会顾问,校友们习惯地称他为老会长。

赵老从事教育工作70年,是一位真诚的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服务的著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观;(二)提倡好学力行校风;(三)实施爱的教育。他的生平经历可以用5个“一生”来归纳,即:勤奋的一生,俭朴的一生,好学力行的一生,从事教育的一生,爱国爱民的一生。1993年10月29日因病辞世后,他的学生写了一副挽联悼念:“伟我校长,献身教育七十年,提倡德才兼备,好学力行,呕心沥血铸市西,后继有人,师表万世;慰兮恩师,艰苦奋斗近百载,发展教育事业,鞠躬尽

瘁，桃李芬芳满天下，新秀辈出，芳流千古。”由于市西和秀中有着姊妹般的亲缘关系，上海校友会开年会时，多次由赵老介绍，借市西中学礼堂举行。校友们赴会时，每次在市西中学门厅举首瞻仰“好学力行”的横匾，就有肃然起敬的感觉。秀中校友总会在1985年召开的上海年会上，也馈赠赵老一架“好学力行，校友楷模”的镜框，以表校友们景慕之忱。

赵老对秀州母校极为关爱，当年他在母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是母校正式定名为“秀州中学”的参与人之一。每谈起世事沧桑，感慨系之。他回忆小时还没有火车，从乡下到城里读书，唯一快捷的交通工具是坐小火轮，哪像现在除了火车还有汽车、飞机。他在母校“八五”校庆时，欣喜地看到新建的“日新楼”雄姿，不由流露出祝愿母校日日新、又日新，兴旺发达的爱校情结。在秀中“九秩”大庆时，赵老在由俞沧泉老师在校庆典礼上宣读的他的讲话稿中说：“我亲眼看到母校的成长，由小学到秀州书院到秀州中学，从姚庄路简陋的小楼到现在偌大的正规校舍，变化之大，真是惊人。……辛亥革命时，在孙中山先生来到嘉兴之前，我们学生就主动剪去辫子，组织军训，宣传爱国思想，激发起要为革命而学习的精神力量，全校爱国气氛空前高涨。后来，黄式金先生、顾惠人先生相继担任校长，学校越办越好，学生爱国爱校爱科学，抗战8年，弦歌不辍。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规模不断扩大，生机勃勃。”

他在论著中说：“我是从秀州中学出来的，秀州的校风就是好学力行，这对我来讲，受益不浅。我也把它贯彻在自己一生的工作实践中。”笔者想，若是他老人家能看到现在祖国欣欣向荣，母校蒸蒸日上新气象，不知要怎样连声赞叹呢！

赵老书生本色，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作风踏实。侧闻昔日他的子女去码头迎接海外学成归来的父亲时，有这样的印象——身穿长衫，手拎箱子，从舷梯下来一个最平常不过的汉子，这就是父亲

吗?父亲怎么是这等模样的!是的,这就是赵老青壮年时期的模样,与当时一般想象中“镀金”的留学生应该是西装革履、目光傲然的派头完全两样。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赵老在会议场合致辞完毕后总会加上一句“谢谢各位!”,这和他声若洪钟的天赋魅力和要言不繁的简捷作风,形成了赵老呈现于众人之前的三点特色。

赵老和夫人张荔令女士都献身教育,白头双辉,毕生辛勤,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当他看了1987年9月1日出版的《牛孩短笛》(母校1935、1936、1937级联合级刊)刊出《园丁新曲》介绍许多老师的简略事迹后,大为赞许,说:“第三个教师节又增添了一道光辉,感到做教师无尚光荣。”他还从73年前即1914年秀州书院师生合摄的照片想起母校,缅怀老一辈师长窦维思校长和师母及姚亮臣先生等为大家打下中学时代的基础,“使我们今天对国家和社会得以有所贡献。”他觉得中学时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一段历程,正在求学的母校学子们务必珍惜这段好时光,切莫蹉跎辜负。要弘扬秀州精神,做“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乐于助人”,为母校增光,为祖国建功的人。

(骆坚卿)

“五四”时期秀州演剧队组织者

顾仲彝(1903—1965),名德隆,以字行,浙江嘉兴人。

1920 届。教授,戏剧理论家。

顾仲彝 7 岁进私塾,10 岁入秀水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又跳级入嘉兴秀州中学三年级插班。“五四”运动掀起的全国学潮,也涌进了治外禁地的教会学校大门。秀州学生为便于参加爱国运动,组织了离校生团,分住在城内同学家里,顾仲彝家也空出一个前楼,住下了二三十个同学。他组织同学演剧队,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打倒卖国贼》等戏剧,曾应嘉兴各地教育会邀请,去新塍、平湖、王店、乌镇、新市、长安演出,持续了一个多月,至暑假才结束。1920 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英文科,因经济来源断绝,两年后不得不停学。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英文编辑,结识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参加文学研究会。不久经洪琛介绍,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开始从事戏剧活动。

1925 年 2 月,顾仲彝应厦门集美学校之聘,执教英文一年半。这段时间,他改译的高尔斯华绥的《相鼠有皮》,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之一出版。同时,他还翻译了《哈代短篇小说选》等书,将外国戏剧改编为《梅萝香》《同胞姐妹》。1927 年,到暨南大学先后任讲师、教授。1930 年秋受聘任复旦大学兼课教授,讲授戏剧概论、英文等课。同年,完成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译作。1933 年春,任复旦大学专职教授兼注册主任。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投入民族救亡运动,写出一批充满抗日激

情的短文和诗篇。1937年10月,上海复旦和大夏两大学合并内迁,顾仲彝只身随校,任这所联合大学的训导主任。次年春,他回沪探亲,应留守上海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聘请,任复旦上海补习部外文系主任。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上海孤岛时期的戏剧活动,先后组织和加入上海剧艺社、上海艺术剧团和国剧团,创作、改编了《孤岛男女》《梁红玉》《人之初》《红楼梦》等剧本,并与费穆、黄佐临改编和导演话剧《秋海棠》。当上海剧艺社第一次演出他改编的话剧《梅萝香》时,他收到日伪的恐吓信,信内附一颗手枪子弹。他不为所动,仍坚持抗日救亡戏剧活动。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顾仲彝续任教授,并参与筹建上海戏剧电影协会和中国文协上海分会。1945年10月,他与李健吾、黄佐临、张骏祥、吴仞之等创办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并任校长。1947年春,为了抗议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他与洪琛、陈望道、张志让筹备组织复旦教授会,并被推举为筹备会主任,起草章程,发表罢教宣言,与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后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指示下,他与欧阳予倩一起去香港暂避国民党的迫害。在香港应欧阳予倩、卜万苍邀请,任永华影片公司编剧,热心于当地进步文化活动,1948年被选为香港文协监事。1949年2月离香港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应聘任中央电影局编剧。1950年调回上海市文化局任电影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为新中国戏剧电影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后又历任上海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理事等职。1957年转入上海戏剧学院,任戏剧文学系教授。1958年与人合作创作了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的话剧《红旗飘飘》,在北京上演后深得好评。

1963年,他完成了一生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归结性的学术论著《编剧理论与技巧》,该书于1984年获全国戏剧理论优秀著作奖。

(辛一)

秀州学校市首任市长

袁伯樵(1900—1996),又名袁树,浙江嵊县人。1921届。教育家,教授,博士。

袁伯樵8岁上学跟村中塾师读四书,1914年,进小学,次年考入秀州书院,插班高小二年级,在校学习,作文列全班之冠。2年后,家中连遭水旱灾,无力供其续学,在老师关怀下,自高小四年级起至1921年(时高小、中学各为4年)毕业,一直参加半工半读。那时秀州有自助生制度,学校让他管图书馆与晚间低年级学生督课的工作,每月可收入2元,除每学期付学费15元(学费3元,膳费12元外),还有余款可作零用。膳费则在食堂搞清洁、洗菜、洗碗来弥补。

1919年8月,校内成立学校市,袁伯樵被选为首任市长。1920年12月,成立校友会,又被选为交谊部部长。

学校市为国内我校首创。1919年4月,窦维思校长由美返华,目睹学生爱国心切,尤其经“五四”运动之锻炼,期望自治,更为迫切,他便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师范院所受之设计教育,因势利导,鼓吹设立学校市,介绍给学校使学生活动入于正轨。学校市有立法部、行政部、司法部。立法部为市议会,有议长、议员;行政部为市政厅,有正、副市长;司法部为市法院,有律师、推事、录事等。其中市政厅又下分警察、教育、卫生、储蓄、外交、膳务等科。校友会至少在浙西各校中,我校也属首创,至1920年,受母校熏陶栽培的,不下千人,毕业典礼已有12次,校友分布全国各处。惜无具体组织,各

地校友深感声气不能相应，情谊未臻联结，对于母校也少贡献，为改变这种情况，留禾离校同学及在校同学代表等在窦维思校长住宅举行一次筹备会，推定第一届毕业生包涵空为筹备主任，袁伯樵等为委员，草拟简章，于1920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校友会。学校市、校友会与当时的爱国会、青年会并列为校内四大组织。袁伯樵任市长，工作积极，对校内秩序的整顿和卫生制度的健全起了推进作用。在兼任校友会交谊部长期间，根据校友会会章“凡本校现任与前任各教职员及毕业修业诸同学皆为会员”的规定，他想方设法加强与各地支会的联系和各地校友的联络，为校友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袁伯樵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他急需积钱以便升学，一年后乃转往宁波四明中学，因其工资比秀州高三倍，第三年又去安徽任教，三年中积蓄了300元。1924年考进南京金陵大学文科，但300元只够一年费用，自第二年起又开始半工半读，1928年大学毕业。毕业后被选任金大附中校长，后又转安徽主持萃文中学。1933年经金大校长陈裕光推荐，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赴美深造。1936年毕业，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获该院最高荣誉金质奖。回国后，历任金陵女大、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与教务长、训导长等职，并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干事长。解放后转至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任教。

1936年至1949年，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有关改革中等教育的专著数十篇，其中《中等教育》一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大学丛书。解放后曾写成《学校卫生学》《巴甫洛夫学说在教育上的应用》，与湖北教育出版社约稿《怎样培养青年的健康》以及英译《针灸学》等书，均因受极左路线干扰，未得发表。

袁伯樵历尽坎坷，十年浩劫，更受磨难，监狱、牛棚、厕所、猪舍都曾“享受”，家中全部书籍、稿件以及收藏的大量古字画，毁损一空，但他坚强不屈，思想达观，终于在个人逆境中挣扎过来，1979

年得到彻底平反。

他欣逢盛世，精神焕发，复以八旬之年，至保定河北大学外文系任教。到八五高龄，仍在编写用英文写的《英语语法》，供大学应用。他说“总我一生，在秀州的七年教育，给我打下了真诚做人，努力向上的精神基础，我有些成就的话，要归功于秀州老师们给我的教育”。

（辛一）

鲁迅的学生和战友黄源

黄源(1906—)，浙江海盐人，1921年就读于秀州中学。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本世纪初，中国。浪起云涌、腥风血雨交织的年代，在江南水乡一个评弹和乞声、茶壶和挣扎并存的小镇，一个热血少年冲破世代叠积的沉闷浓雾，背着简单的行囊走了出来。他就是后被鲁迅先生誉为“向上的认真评述者”、又被现代鲁迅研究家称之鲁迅的学生和战友的黄源。

黄源名启元，字河清，1906年出生在浙江海盐县的一个清贫之家。祖父和父亲对孩子的最大期望不过是继承父业，当上一名清白的小学教师，安稳地混口饭吃。谁知，一场“五·四”运动的风暴，冲击到了偏僻的小镇，把这个13岁的少年推向新文学的道路，通过新文学又奔向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征程，谱写了平凡而光辉的一生。

处于“鱼米之乡”的嘉兴市秀州中学，英语教育的师资强，课时多、要求严。1921年，黄源就读于秀州中学，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嘉兴距文化发源地的上海较近。第二年秋天，黄源跟他姑夫朱宗良来到上海，住在于右任家里。于右任曾主办《民生报》以反对袁世凯，朱宗良是于右任的主要助手。这使黄源有机会遍阅上海的报章杂志，《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文艺版”，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都成了他的文艺课堂。特别是茅盾主编的《小说月

报》更是每期必读,《月报》出版介绍的大量外国文艺作品,打开了黄源的眼界,把他的思维引入世界文学的大门,而“创造社”激动人心的作品又引起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转学到南京读书的那一年,他见到了世界文豪泰戈尔,认识了诗人徐志摩,参加了南京各大学主办的名家学术演讲,听了章太炎的讲演。这时的黄源已从单纯的求知而产生一种朦胧的追求。因而,对南京学校的复古、抵制新文化极为不满。

1925年,黄源获知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校长是浙江“五·四”运动的引导者经亨颐先生,还有著名的学者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和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同毛泽东共事的匡互生先生都在那里执教。黄源毅然离开大城市转学春晖就读。在夏先生处,他从英文接触到日本的文艺书籍;又在丰先生那里借到英美文学名著的日译本。他在“春晖”学会了日文,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

1927年,黄源跟匡先生回到上海筹建立达学院,并就职于刚创办的劳动大学编译室。他终于跨出了对他一生影响最为关键的一步。“四·一二”事变后,鲁迅先生从广州来到上海“劳大”作演讲。校方指定黄源记录。他的记录经鲁迅先生审阅修定后,相继发表在《劳大周刊》和《劳大论丛》上,这是他第一次与鲁迅先生接触,也是首次经手鲁迅先生的文章。四天后,鲁迅先生又在立达学院作题为《伟大的化石》的演讲,揭露蒋介石夺取革命胜利果实,行反革命之实的罪行。这次,又是由黄源作记录,并与匡先生一起在会后陪同鲁迅先生休息,进茶点,漫谈。鲁迅先生的任意谈笑,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更深一步学习日语,1928年黄源东渡日本求学。当时的日本几乎是世界文学的窗口,黄源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跑书店、阅原著的研究中,更加开拓了视野。更为有幸的是在日本东京市的旅馆里,他认识了正隐姓埋名埋头创作长篇小说《虹》的茅盾,并一直是

茅盾住处的常客。

1933年，由郑振铎、傅华东公开出面在上海创办的进步文学月刊《文学》杂志，实际上是茅盾在主持，并得到鲁迅、左联诸同志和巴金、郁达夫等著名作家的支持。编辑委员会中左联领导人占多数。黄源是《文学》杂志唯一的专职编辑。他经常出入茅盾先生的家里，向他请示、取稿。也在这里，黄源直接和鲁迅先生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从1933年7月《文学》创刊号起到1935年10月止，鲁迅先生在《文学》上发表的译著共25篇，几乎都由黄源经手。

这时，黄源自己虽已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生平和作品》、《一九〇二年级》、《将军病死在床上》、《高尔基代表作》等等，但《文学》作为“左联”和进步文学界反文化“围剿”的主要阵地之一，他的主要精力是当好编辑，并有意识地参加了战斗。鲁迅先生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书报检查制度，同时想介绍一些外国的文学杰作，决定创办《译文》杂志。茅盾就举荐黄源当《译文》的出面编辑和接洽书店的承印事宜，并立即得到了鲁迅的同意。于是黄源从1934年帮鲁迅办《译文》，直到鲁迅逝世，参加葬礼，一直在先生的身边，使他得以在鲁迅晚年亲聆鲁迅的教诲和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至今保存下来的鲁迅给黄源的38封信，大都是有关编辑《译文》方面的意见和指示。今天，黄源已届耄耋之年，他在《忆念鲁迅先生》和《在鲁迅身边》的著作中写道：“我原来是搞文学的，最多是搞革命文学的吧。可以从接触鲁迅先生之后，我的人生道路起了显著的改变，最终走上了参加革命武装，为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而战斗的道路，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抗日战争爆发了。就在鲁迅先生周年忌日的前夕，黄源校对完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而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后，投笔从戎，离开了上海。1938年12月，黄源来到新四军军部，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初，黄源在江南某地数次与久闻大名的陈毅邂逅，两人共睡一床。夜幕降临，黄源静静地聆听陈毅那饶有风趣的言谈，

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皖南事变前，黄源是新四军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抗敌》杂志的文艺部分，还为《抗敌报》编文艺副刊。为让文艺创作更好地为部队服务，黄源和彭柏山、石西民、夏征农、冯定等共同发起编辑《新四军一日》一书，向全军征稿。活动立刻得到军部批准，陈毅亲自带头，以“绛夫”的笔名写了《十月十五日》一稿，作为《新四军一日》的特辑，发表在《抗敌》杂志的“文艺专号”上，于是全军官兵上下响应，历时一年半，选用来稿约百万余字。这些来稿，反映了新四军官兵战斗在大江南北的亲身经历，是些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部队行军时，黄源担在肩上的沉重行李中，主要是《新四军一日》的稿件，可惜未能来得及出版，毁于“皖南事变”，成为历史的遗憾。

1941年1月12日傍晚5点，新四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被敌人突破，黄源和军部首长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失散。军长叶挺被俘入狱后以为黄源大概阵亡了。石西民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了《忆黄源》的悼念文章，第一句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说是鲁迅的高足、《译文》杂志主编黄源先生在皖南突围时牺牲了。”事实上黄源没有死，他突围出来后回到上海，通过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和地下的新四军办事处联系，于5月前夕到了苏北根据地。陈毅见到黄源，欢笑着大声说：“黄源，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

皖南事变后，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黄源任鲁迅学院教导主任。1942年12月军部转移至淮南地区。黄源随彭康到新开辟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负责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找工作，兼鲁迅学院院长。他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文艺工作方针，对流动在游击区的越剧“草台班子”进行改革。历史上首次越剧男女合演就是在这里诞生。深受群众欢迎。

抗日胜利的鞭炮声还没有停下，解放战争的枪声已经打响。黄

源随军到了山东。他以华中文协主任的身份在华东四纵政治部工作，后来又随叶飞为司令的一纵，亲历战场。当叶飞、陶勇等三个部队总攻枣庄时，黄源就在一旁作记录，从战斗开始到把敌人歼灭，粟裕电话里说一句，他记一句。这份记录叫《枣庄总攻之夜》，字里行间闪烁着我军高级指挥员知己知彼、速战速决的唯物辩证智慧。

上海解放。黄源一进入上海，就去拜访了雪峰、巴金、胡风等老朋友，共庆同欢。黄源任上海文管会副处长，负责接管音乐学院、戏剧学校、管弦乐队等文化机构，并主管文艺处的机关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黄源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华东局撤销，黄源调浙江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党组书记。这期间，他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组建了浙江省民间音乐舞蹈团，在全省选拔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浙江民歌、狮子龙灯舞在北京舞台上演，震动了全国的文艺界。最为显著的是他领导和组织对昆曲《十五贯》的改编，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扬。《人民日报》“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社论，对这一改编加以肯定。

但，如此一位几十年勤恳为党的文化事业奋斗不息的鲁迅先生高足，却在“反右”和“文革”中大遭劫难。身处逆境的黄源对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就是在大跃进浮夸风的年代，他仍不顾安危，无所畏惧地给地委书记写信：“亩产没有万斤。”“四人帮”打倒后，茅盾同志为黄源和陈学昭的右派平反问题给中央写信。1979年，党终于给黄源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重归文艺领导岗位。这时他虽然已有73岁的高龄了，但他工作的干劲不减当年。如今已是95岁高龄，仍担任全国鲁迅研究会顾问、全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积极宣传鲁迅精神和党的文艺路张、方针，继续发挥一个文艺战线老兵的光和热，令人万分敬重，仰之弥高。

（余小沅）